

唐中期

官德思想研究

刘亮红◎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唐中期 官德思想研究

刘亮红◎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中期官德思想研究 / 刘亮红著. —湘潭: 湘潭
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81128-866-7

I. ①唐… II. ①刘… III. ①干部—道德修养—研究
—中国—唐代 IV. 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第 232481 号

唐中期官德思想研究

刘亮红 著

责任编辑: 王正杰

装帧设计: 廖 铁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1-5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press.xtu.edu.cn>

印 刷: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8-866-7

定 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综述	(1)
1.1.1 关于官德内涵的研究	(2)
1.1.2 关于唐中期官德理论基础的研究	(5)
1.1.3 关于唐中期官德认识的研究	(7)
1.2 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10)
1.2.1 研究对象	(10)
1.2.2 研究意义	(16)
1.3 基本结构及研究方法	(19)
1.3.1 相关概念的界定	(19)
1.3.2 基本结构	(24)
1.3.3 研究方法	(27)
第 2 章 官德式微的唐中期社会	(29)
2.1 君臣大义不明的唐中期政局	(29)
2.1.1 藩镇割据背国忘君	(30)
2.1.2 宦官专权君臣道隔	(34)
2.2 先文学后德行的科举取士制度	(38)
2.2.1 秀才之科难得其人	(39)

2.2.2	明经进士崇末抑本·····	(42)
2.2.3	争第请托亏损国风·····	(46)
2.3	倡明官德不力的儒学·····	(50)
2.3.1	道教融汇儒佛修身治国之道·····	(51)
2.3.2	佛教心性论与儒学争胜·····	(59)
2.3.3	儒学治国乏力治心无门·····	(65)
第3章	唐中期官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77)
3.1	天人关系论·····	(77)
3.1.1	天与人相乖相异论·····	(78)
3.1.2	天与人相分相对论·····	(84)
3.1.3	天与人相胜相用论·····	(90)
3.2	人性论·····	(97)
3.2.1	性三品说·····	(97)
3.2.2	复性说·····	(106)
3.3	儒家之道·····	(113)
3.3.1	仁义之道·····	(114)
3.3.2	性命之道·····	(122)
3.3.3	大中之道·····	(133)
第4章	唐中期的官德规范及其德目·····	(146)
4.1	修己之德·····	(146)
4.1.1	忠孝·····	(147)
4.1.2	诚信·····	(155)
4.1.3	明智·····	(172)
4.2	君德·····	(197)
4.2.1	从谏·····	(198)
4.2.2	任贤·····	(206)

4.2.3	从众	(217)
4.3	臣德	(225)
4.3.1	与君同体	(226)
4.3.2	匡正辅弼	(229)
4.3.3	利民安俗	(233)
4.4	君臣之际	(241)
第5章	唐中期官德思想的制度化表达	(249)
5.1	官制	(250)
5.1.1	取士	(250)
5.1.2	铨选	(255)
5.1.3	考课	(259)
5.2	礼制	(265)
5.2.1	祀天之礼:昭格上下,遵从等威	(268)
5.2.2	祭地之礼: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	(271)
5.2.3	享宗庙之礼:尊九庙以崇孝,谒五陵以奉 先	(275)
5.3	律法	(282)
5.3.1	专制秩序性律法	(283)
5.3.2	家庭伦理性律法	(294)
5.3.3	职务性律法	(312)
第6章	唐中期的官德修养思想	(325)
6.1	“修己立诚”的官德修养论	(326)
6.1.1	理想人格论	(326)
6.1.2	“修己立诚”的修养工夫论	(343)
6.2	“去情复性”的官德修养论	(351)
6.2.1	圣贤理想人格论	(351)

6.2.2	至诚尽性的修养境界论	(366)
6.2.3	去情复性的修养工夫论	(369)
6.3	“方其中圆其外”的官德修养论	(375)
6.3.1	理想人格论	(376)
6.3.2	修养工夫论:方其中圆其外	(386)
第7章	唐中期官德思想的历史地位	(396)
7.1	前承汉代之德治传统	(396)
7.1.1	重士德	(397)
7.1.2	重孝治	(399)
7.1.3	重任贤	(400)
7.1.4	重君臣纲纪	(404)
7.2	中逆魏晋之自恣无君	(408)
7.2.1	反以无为为本宇宙观	(409)
7.2.2	否认无为而崇有为	(412)
7.2.3	弃无君而推尊君治	(415)
7.2.4	似曾有恣而实自励	(419)
7.3	后启宋儒内圣外王之合一	(426)
7.3.1	中兴儒学之路径被因袭	(427)
7.3.2	以心通经之方得以光大	(430)
7.3.3	内圣外王之合一启新章	(434)
结论		(439)
参考文献		(451)
后记		(461)

第1章 绪论

官德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是人事之大经，政事之根本，它不仅引领着整个政治道德的发展方向，而且对社会其他方面的道德建设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任何事物都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尽管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多样的官德要求与规范，但任何一个时代的官德都会体现官德作为社会客观存在的共性的、一致性的特质。因此，对相关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既弄清唐中期官德思想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产物所体现的政治道德的共性，又了解其问题所在与研究现状等，是更好地开展唐中期官德思想研究的起点与基础。

1.1 研究综述

学界也好，政界也好，说起“官德”似乎人人都有发言权，因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每个人都能对现实社会的官德有自己的体会与认识，但是，要说清楚“官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原因既在于道德的特殊性，也在于道德标准的不确定性，更由于道德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关联性。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官德”的研究成果林林总总、卷帙浩繁，视角不一，方法各异，既有就

官德整体进行高度概括的，也有专门就官德某一方面而深入探讨的；既有古代官德的，也有现在的领导干部道德修养与标准的；既有群体官德研究的，又有个人官德研究的；既有官员为政道德等公德内容的，也有关于领导干部私德内容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以“唐中期官德思想研究”为题的研究尚无专门成果与著作，加上“官德”是“政治道德”，但是，前人已有成果中对于“唐中期官德思想”这一问题还是有所涉及的，毕竟不管是哪个时期，官德思想都具备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些共性；而且在官本位的古代社会，人们对官员道德的要求也是具有许多共性的，而这些共性的东西是可以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一定的基础的。鉴于本书写作中所涉及的问题，笔者分几个方面对前人研究成果中与本书有涉的相关成果进行简要介绍，并从笔者论文角度作一些粗略的分析与评价。

1.1.1 关于官德内涵的研究

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准确把握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思维的起点，更是本书立论的前提与基础。但因概念既具有严格固定的内容又有一定的模糊性，既具有抽象性又具有普遍性，因此，对本书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官德”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综述就显得非常必要。

对“官德”的界定较普遍的有以下定义法：一是把“官德”定义为“为官从政之德”；二是将“官德”定义为“官员的职业道德”；三是认为，“官德就是权力道德，即居官从政者的职业道德，亦即各级官员运用权力、执行公务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四是将“官德”定义为“从政为官者在一定岗位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方面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尽管上面表述各有不同，但内涵大同小异，其共同的特征是将官员为官看做一种职业，从而将“官德”定义为官员的职业道德或与职

业紧密相关的权力道德。这种主要从职业道德来定义官德的内涵虽然也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与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对于官员的要求极不相称。对于官的前身“儒士”，传统文化中从未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职业，而是赋予其较高的身份地位，社会对儒士也有着极高的道德期许。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仍然顽固存在的当代社会，正如李建华所指出的，把“官德”定位于职业道德，“不仅是给官德的理论研究带来了混乱，而且给官德建设也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利”。^①李建华在其论著《中国官德：从传统到现代》中分析了官德定位不准给官德理论与官德建设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②，主张将“官德”定位为“角色道德”，从身份伦理的视野来定位官德。他认为，官德作为一种角色道德，包含着角色责任、角色技能与角色调解等要义。^③李建华的这一角色定位超越了将“官德”混同于一般职业道德的标准，将官员道德对于社会发展、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特殊示范性更加突显出来，也更加符合具有深厚儒学传统的中国社会的特征。因为，中国传统官德就是儒家诸如圣贤、君子等身份伦理及其制度化的体现，从人性、人伦、人道等不同层次，对身份角色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规约，以社会成员的基本身份定位为核心，而不是以职业领域为关键去提出要求、制定制度的，可以说，对官德进行角色伦理的定位抓住了中国传统社会以人的身份为依据来确定不同的存在方式及社会评价标准这一关键特征，更符合儒家传统社会制度设计的内在理路，也更容易找到道德实践的社会共鸣。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从来都是多视角的，上述李建华就是从伦

① 李建华：《中国官德：从传统到现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32

② 李建华：《中国官德：从传统到现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32—36

③ 李建华：《中国官德：从传统到现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43—44

理学的视野来界定“官德”的本质属性的。许启贤则从官德的外延角度来定义官德所涵盖的道德要素，他认为：“如从横向理论上，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思想大致可包含‘政德’——这里狭义的政德是特指政治活动中的道德策略、道德原则；‘官德’——从政者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品质。这其中又包括‘君道’与‘臣道’两个主要部分。”^①许启贤是将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分为君德、臣德与政德三大部分的。君德就是王者之德，君主之道，臣德就是事君之德与安民之德，君德与臣德构成了官德的主体，而政德是君主与大臣在为政理事中都应遵守的道德与规范，贯彻于君德与臣德的始终。笔者认为，李建华的官德界定抓住了中国传统官德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起点，而许启贤的界定则是贯彻了传统儒学社会中官德的不同身份不同道德标准的原则，对官德进行了一目了然地的外延界定，既符合传统官德的理论逻辑也体现了传统官德的社会实际。

张梦义、喻承久在其著作《官德论》中对官德的本质、基本矛盾及基本特征作了系统的阐发，指出官德的本质是官民利益矛盾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是对权力运行行为的规范与调节方式，是官员改造社会的实践精神，是关于从政用权的意识、信念、行为准则、评价选择、理想目的等的价值体系；官德的基本矛盾是官民利益矛盾，即官员个人利益、人民群众利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官德的基本特征在于其极强的政治性、社会的极高期望性及全面制约性。^②

三人对于官德的界定各有特色又很具代表性，分别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官德的本质与内涵，也揭示了“官德”的普遍意义与特

① 许启贤为肖群忠《君德论——〈贞观政要〉研究》所作序，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张梦义，喻承久，官德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45—82

殊价值之所在。通过对以上定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官德”的普遍意义在于它具有一般职业道德的共性,我们提到“官德”时自然无法否定其作为职业道德的一般规范与基本要求,但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只具备职业道德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社会与民众对作为具有较高身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享有较大职权的官员有着超出一般职业道德的更高要求。在儒家传统中,做官先做人,正人先正己,只有做好了人才能做好官,只有自己身正行直才能管理约束好百姓,做好人是为官的道德前提。所以说,儒家传统中所要求的“官德”更多地是从与民相对应的身份角度对官员所提出的较高道德要求与行为期许,“官德”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

1.1.2 关于唐中期官德理论基础的研究

在唐中期官德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本书考虑到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可行性方面的论证需要,以及选取唐中期几位思想家为典型案例的研究方法,所以主要从天人关系论、人性论及儒道论等方面与官德修养息息相关的已有成果进行了集中关注与梳理。

关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思想、人性论及儒道论在有关人物思想研究中,都是一个重要的部分,相关成果也较为丰硕。在天人关系论方面,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天人关系论。学者一般都高度肯定柳宗元系统的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学思想,认为这种思想“具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内容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关‘天人之际’问题长期争论的新的理论总结,代表着唐代思想理论发展的新高峰”^①,“为解

①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55

答全部自然、社会问题提供了更为科学和坚实的自然观方面的基础”。^①《刘禹锡评传》认为“刘禹锡批判了天命神学世界观，总结了先秦以来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从内容、体系、战斗性和科学性方面来看，不仅在唐代是最为突出的，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以其创造性的理论建树而占有独特的地位”^②；他不仅从哲学的意义上划清了天道观上“自然之说”与“阴鹭之说”的根本界限，而且对从董仲舒到韩愈的一切有神论思想，甚至包括玄学和佛学的基本论点进行了理论清理。^③而在人性论方面，无疑是李翱的性恶情恶论理论水平最高、对后世影响最深远了。李翱有关心性的论述，借佛家心性之说，着重发扬《中庸》的心性学说，对宋代理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欧阳修曾言，李翱《复性书》即是“《中庸》之义疏”^④。章太炎也说：“明心见性之儒，首推子思、孟子。唐有李习之（翱），作《复性书》，大旨一依《中庸》。”^⑤在天道论方面则当首推韩愈道统论，其合仁与义而言之天道理论更多地是从道德与政治伦理立义。陈寅恪在《论韩愈》中高度评价韩愈“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的功劳，认为韩愈道统论的提出表面上是继承孟子思想而来，但“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⑥，而且认为道统论的确立者非韩愈莫属，即使后来的宋儒将韩愈排除在道统传承人之外，事实上却无法否定其地位。朱熹尽管将韩愈排除在儒家圣贤道统谱系之外，但把韩愈看做孔子、

①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65

② 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9

③ 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7

④（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十三·读李翱文》，上海：上海书店，1989，532

⑤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81

⑥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2）

孟子之后弘扬儒家学术传统之第一人，说对于道，“这个道理，自孔孟既没，便无人理会得。只有韩文公曾说来”。^① 还说：“韩退之则于大体处见得……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他见得。”^② 关于唐中期官德思想哲学基础的认识，正如冯友兰所总结的，他们“所注意的不是人的生死问题，而是社会的治乱问题。他们所注意的不是因果报应，而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③ 充分肯定他们发扬儒家传统入世精神与积极的治事态度。

1.1.3 关于唐中期官德认识的研究

对于唐中期个人道德认识的研究，因为是以个案为研究对象，相对前面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加鲜明，而且与本书的相关性也更大，但却鲜有专门的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论及。何惠风在其硕士论文《论唐玄宗〈老子注〉中的官德思想》中分析了唐玄宗的官德思想的理论基础、道德基石、价值目标、豁达胸怀与自律修身之道。^④ 关于韩愈的官德认识的研究，较早的有龚抗云的《论韩愈的德育思想》，该文指出，韩愈是理学德育思想的先驱，其德育思想的内涵有：德育内容乃是“明先王之道”；德育目标是“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为人准则和“既善己而必以兼济天下”的圣贤追求；德育的作用及其局限都在于教上者而制下者；德育中教与学无定式，“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德育中自我教育的方法和态度是“责于己者重以周，待于人者轻以约”。^⑤

①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4，423

②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4，3256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44

④ 何惠风．论唐玄宗《老子注》中的官德思想：[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长沙：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2009

⑤ 龚抗云．论韩愈的德育思想．船山学刊，1996（1）

美国汉学家蔡涵墨高度肯定韩愈于儒家道德的历史贡献,认为韩愈是言行一致的真儒士,“相对于众多与其同时代的人士,韩愈选择了一条最艰辛的道路。腐败堕落、放弃政治理想、归隐山林或逃避现实从佛教、道教中寻求慰藉,这些表现在韩愈看来都是‘诚’的缺失,是对儒家道德的背叛”。^①方浩然研究了韩愈的道德思想,认为韩愈的儒家之道分为人生价值与社会政治两个方面,在人生价值层面是“正心”,在社会政治层面是“有为”,通过正心诚意才能实现有为,从而达到社会政治与人生价值的统一。文章还分析了韩愈“正心”思想的内涵与实现途径。就韩愈道德思想的影响,文章指出,韩愈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结合《大学》的正心、有为,是希望将道通过“正心诚意”内化为心性的伦理道德,达至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将践行儒家之道作为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而其礼法思想则是其对仁义道德思想的补充与强化。^②

李钟麟在《柳宗元官德研究》中对中国官德传统的形成、儒家“为政以德”的现代走向、柳宗元的为官目的论、为官用人论、为官修养论、为官风格论、为官职责论及柳宗元官德思想的现代价值一一作了剖析。^③从其内容结构可以看出,本书的写作完全是按中国现代人们对官德的一般了解为主要内容的,集中解答了现在社会人们所关心为什么当官、应如何为官、如何加强官德修养等方面而展开研究的,与本书所定义的儒家传统道德的“官德”的研究范式有所区别。卢红指出,柳宗元关于德思想和论述,是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观和“天人不相预”的立场出发,

① 陈培文.论美国汉学界的韩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2011,26—27

② 方浩然.韩愈道德思想研究:[哈尔滨工程学院硕士论文],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0

③ 李钟麟.柳宗元官德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在批判“天命”“君权神授”的过程中展开的。卢红指出柳宗元认为“德”的政治意义在于对于国家的治乱兴废的重要影响，“德”的个体价值在于对于人的社会性发展的影响。^①徐伯鸿研究了中唐社会政治背景下柳宗元关于官员与国家政权兴亡的关系、“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的官吏选任标准、“公议”和“博谋”相结合的官吏选任方式、官吏利民安人的素养与为官理念、官吏的为政之术等^②，主要涉及的是柳宗元为官的理念及其具体实践，而与官德的联系不甚紧密。

关于李翱官德思想的研究方面。《李翱评传》中研究了李翱的《复性书》及其复性以修养至圣的忘情复性的方法，指出李翱为人们设计的修养方法分两步进行，一是“无虑无思，斋戒其心”，二是“动静皆离，寂然不动”以“至诚”。^③王淑青在其硕士论文《李翱“援佛入儒”道德修养观研究》中主要从李翱对佛学的吸纳这一理论前提出发，集中研究了李翱道德修养观的人性论基础、李翱的道德修养方法及道德修养境界等。^④王宏海也在其硕士论文《李翱思想研究》中就李翱的人性论思想进行了研究，指出李翱提出了斋戒、至诚、明道的复性过程，与佛教天台宗倡导“戒、定、慧”及禅宗的“禅定”修行方式极为相似。^⑤

此外，关于唐中期官德的内在道德约束与外在制度规范方面的研究完全是自成体系的，并没有与官德联系起来，笔者在进行

① 卢红. 柳宗元论德的价值. 江汉论坛, 2004 (02)

② 徐伯鸿. 谈中唐之社会政治背景下的柳宗元官论思想.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04)

③ 卞孝萱, 张清华, 阎琦. 李翱评传.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29—533

④ 王淑青. 李翱“援佛入儒”道德修养观研究: [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2007

⑤ 王宏海. 李翱思想研究: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2004